

阿非利卡人和黑人 经济结构的趋同 与南非土地问题的形成^{*}

孙红旗

内容提要 17世纪中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雇员抵达好望角，建立了开普殖民地。在之后的200多年中，本土化的殖民者阿非利卡人成为南非土地的主人，这意味着不到14%的阿非利卡人占据了全国87%的土地，南非遂成为世界历史上土地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导致南非土地问题陷入困境的原因很多，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双方经济结构趋同，造成殖民者和原住民激烈争夺土地资源，这也是南非土地问题形成的内在历史根源。

关键词 南非 阿非利卡人 原住民 经济结构 土地问题

作者简介 孙红旗，历史学博士、徐州师范大学亚非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徐州221116）。

南非是世界历史上土地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造成南非土地问题陷于困境的原因有很多，国内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相关探讨。笔者认为，历史上，荷兰殖民者占据开普的结果是，荷兰人成为本土化了的殖民者——阿非利卡人，并逐步蚕食和侵吞了几乎整个南非的土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掠夺方式取决于生产方式，¹ 荷兰人是布尔人，^④ 是欧洲最优秀的农夫，但南非大草原的地理和气候环境决定了他们只能和当地人一样，采取粗放的方式经营农场。作为征服者，殖民者一般都拥有比殖民地原住民较为先进的生产方式，但阿非利卡人并非全然如此，正是他们与当地有色人和黑人民族经济结构的趋同，导致对土地资源的激烈争夺。

—

阿非利卡人与南非黑人各民族的冲突，从经济结构层面来说，不是由于他们的不同，而是由于他们的相同或相似使然。

在阿非利卡人到来之前，南非的科伊桑人或黑人士著民族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他们随着季节变换而进行小范围迁移，同时随着代际更替进行长距离的迁徙，几乎没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由于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各民族基本上不存在内部关系的紧张。只是班图人在南下与科伊人相遇时，双方发生

* 本成果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资助。

¹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④ “布尔人”（Boer）在荷兰语中为“农夫”之意。

过一些碰撞，但这也是温和的，并没有导致大规模种族冲突，而是一些科伊人融入了班图社会，而班图人则从科伊人那里学到了更多的畜牧知识。

荷兰人涌入南非，在度过了相对短暂的和平相处时期后，随着白人的东扩或北进，南非出现了土地资源——牧场的紧张，白人和科伊桑人及其他各黑人民族、各黑人民族之间为争夺稀缺的土地资源开始相互厮杀。因为阿非利卡人作为一个种族群体并没有带来先进的生产方式，而是以同样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在同一经济结构的框架内、以不公平的方式参与了竞争。加之在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如阿非利卡人的土地观念，市场和贸易的刺激，还有其独特的社会阶级结构，受其粗放的生产方式制约，阿非利卡人“不得不”进行土地扩张战争。

阿非利卡人的经济结构在范·里贝克及其随从在开普登陆后 25 年中就形成了。也就是说，一种放牧和狩猎的边疆已经存在。他们越来越和非洲本地民族一样，主要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牧农经济生活。来自北欧低地国家、善于耕作的条顿农民，为什么会“沦落”到与他们瞧不起的黑人过着同样“放荡不羁”的生活的地步？其中有很多主客观原因。笔者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南非的自然地理条件和阿非利卡人的经济结构这两个相关的重要因素：南非既有广阔丰饶的土地供“随意”占据；同时，与班图人和其他原住民一样，布尔人的生活也受制于南非的自然地理条件：南非丰饶而广阔的土地绝大部分只适合于牧业经济，在生产力水平尚低的情况下，只能进行粗放经营，游牧仍是获取财富的最经济、最简捷的手段。从气候环境看，南非是一个严酷的次大陆，没有欧洲那样柔和的温度。南非更不像荷兰那样一年四季分布比较均匀。在南非次大陆，即使是水源较为充足的东部 1/3 地区及其草原地带，也受到飘忽不定的雨量和惩罚性干旱的影响。¹ 南非的土壤大多是沙土，缺乏有机成分，结构非常松散，地力极易耗尽，且易被风、雨侵蚀。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人们应该不难理解：原本以农业为主的班图各族为什么越往南迁，就越在自己的经济生活中增加了游牧的成分。这一方面是在征服和融合科伊桑人的过程中学到了对方的畜牧经验，另一方面也是自然气候和地理条件限制使然。事实上，班图人一开始时并未放弃农业，但可以想见，无论原来的经验多么丰富，非洲人赖以生存的农业在这样一种环境里具有许多不确定性，时饱时饥，有时是严重的饥荒。为了对付这种反复无常的命运变化，非洲人社会内部形成了一种互助体系。劳动分工按照性别进行，妇女从事农作，而男子负责放牧，因为牧业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非同寻常。由家庭、亲族、年龄及其他联系交织而成的关系网络，延伸到更广阔的区域，包括许多村庄，甚至回溯到久远的祖先，共同的祖先为他们提供了超自然和神圣的联系纽带。这样，他们就形成了一种社会安全体系，个人、群体之间相互支持和保护，既是责任，也是义务。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南非各民族的生产方式主要体现为一种社会财富（土地和牲畜）的再分配方式。一些学者认为，殖民时期以前南非经济的特征就是“再分配的生产方式”^④。一夫多妻制既加强了个人的经济地位，也扩大了家庭的社会联系。这与阿非利卡人极端个人主义极度膨胀的状况大不相同。

维生经济造成的一个结果即是一种强烈的、终生的对土地的热情。因为土地意味着安全，不仅已耕地和牧场，即使周围的灌木丛对非洲人的生计也有重要意义。当庄稼歉收、牲畜死亡的时候，灌木丛还可给他们提供可吃的树叶和根茎，由此还可以维持群体的生存。土地和村社密不可分，聚合在由家族向外扩大的社会模式中。人们举行敬奉土地的仪式，因为土地埋葬着他们祖先的身体，它是本民族自身的体现，土地给予族体以生命、生存能力和安全感及认同感。个人不可能拥有土地，土地属于民族集体所有，祖先把土地授予酋长，由他分配给个人使用，每个个体无所有权。

范·里贝克和他的自由民开始时并不想过上与他们眼中的土著相似甚至是相同的生活。他们本是来自欧洲的农民，他们的故乡傍依着莱茵河和马恩河，那里的气候十分温和，四季降雨量均匀适中，

¹ See N. Pollock and S. Agnew,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South Africa*, London 1963 p. 16.

^④ M. Legassick "South Africa: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Violence", *Economy and Society*, Issue 3, August 1974, p. 288.

地势相当平坦，海拔最高也不过 320 米，沿海地区几乎全在海平面以下。在这个欧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小国里，土地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最珍贵的财产，可谓寸土寸金，为了让脚下的土地延伸，他们世代代同沼泽和大海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通过排干沼泽和围海造田来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也许只有在梦境里他们才会见到南非那样一望无垠的草原。在北欧那片只有 37 291 平方公里的狭窄国度里，他们精耕细作，农业水平堪称欧洲的楷模。来到陌生的阿非利加洲，他们给自己取名为“布尔人”。正如这个名字所提示的那样，他们欲成为令人尊敬的农夫。他们在开普周围种植了烟草和蔬菜，为它们所隶属的东印度公司的过往船只提供给养。在 17 世纪八九十年代和 18 世纪初，即在总督西蒙·范德斯泰尔（Simon van der Stel）和威廉·亚德里安（W illen Adriaan）父子统治时期，他们极大地扩展了农作物种植的种类，西蒙种下了燕麦和小麦，他的儿子引进了欧洲式的葡萄园，酿造的酒深受过往船员的欢迎。东印度公司的统治者也乐于看到这样的景象，他们的理想统治模式是：集约型的农业经营和密切的邻里关系，在行政上便于管理和监控，在经济上则可以保证公司的绝对垄断。

但这样的状况没有维持多久，因为适于农耕的气候和土壤只存在于开普周围和海岸地带。进入内地后，不再有地中海式温和的气候或类似故国的那种适宜农作的有利条件。他们尝试过向北方扩展他们的菜园和麦田，但正如班图人一度试图向南方延伸他们的非洲作物一样，均遭失败。毫无疑问，在殖民早期，南非的经济生活是由地形和气候决定的。南非的土地面积虽然广阔，但具备充足和可靠降雨的地方十分有限。如同几乎位于同一纬度的澳大利亚一样，南非的降雨量在东海岸比较丰富，在内陆逐渐减少，直到西部则成为半沙漠和沙漠。即便在开普地区，至少一半的地方年降雨量只有 254 毫米或以下，并且这些地方的降雨几乎全集中在夏季，在非洲灼热的阳光照射下，蒸发率很高，只有开普敦周围狭窄的地带冬季才会有降雨，而在降雨时夹杂着冰雹的事例也不罕见。¹ 在这样的地区，从事农耕几乎不可能，甚至无法驯养动物。在这样干旱的地区，也仅仅能够维持生存而已。在气候反复无常的那些年份，布尔人的生活可以用穷困潦倒来形容，而他们的生活窘境本可以通过与内地黑人和过往船只的双向贸易来改善。然而，东印度公司的行政控制和经济垄断严重地限制了布尔人的发展。

二

为了挣脱公司的专制统治和获得久违了的自由，为了生存和发财致富，布尔人离开海岸，到了内地。如果说当初他们在开普周围的活动是在“无主”的条件下进行农业生产，那么自 17 世纪 90 年代起，他们就不再是在“无主”的空旷土地上放牧牲畜了。一批又一批的布尔人离开开普殖民地进入内陆，在没有征得科伊桑人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占据（squatting）了他们的土地，同时掠走了他们的牛羊。^④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才是南非历史上第一批真正的“擅自占地者”（squatters）。此后，布尔人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本质性变化。他们抛弃了所擅长的小农集约耕作，转而经营自己并不熟悉的大牧场——因为从事放牧的主要是雇佣来的科伊桑人。他们这样做并非说明他们农艺的退步，而是因为经过种种经验教训，他们知道在南非内陆高原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下，从事集约农耕的边际效益很差。基韦特指出，布尔人经济生活的变迁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从农业到牧业的转变是顺应了南非的自然条件，顺应了此条件下的经济生活的自然法则。^⑤ 因为当地资本和劳动力缺乏，而土地则便宜和充裕。集约农业要想达到预期的收益，需要相当的资本开支和劳力付出，而当时并不具备上述条件，特别是

¹ 如在 19 世纪 60 年代，据官方文件记载，南非一些地方在经历了长期干旱，以及随之而来的蝗虫等灾害后，又遭受严重的暴雨和霜冻及冰雹的袭击，给农作物和牲畜造成重大损失。See Report of the Civil Commissioner for Bedford Cape of Good Hope Blue Book 1864, Appendix p. JJ 25. Quoted in D. Hobart Houghton and Jenifer Dagut *Source Material on the South African Economy: 1860 - 1970*, Vol. 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28 - 29.

^④ See the Black Scholar Summer 1994, Volume 24 No. 3 p. 40.

^⑤ See C. W. de Kiewiet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Social and Economic*, London 1941, p. 13.

后者。在这样的情况下，粗放使用土地反倒体现了真正的效率或效益。世界银行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土地中心通过对非洲农地制度与农业绩效的研究，证明在土地资源仍然比较富余的情况下，开垦新的土地比对原有土地进行投资更经济。¹ 于是，布尔人耕种少而猎获得多，购买得少而交易得多，他们的经济生活标准很快降到不断渴求土地的水平。根据传统的经济史观点，人类逐步从狩猎过渡到放牧，最后是定居的农业生活。但在南非的阿非利卡人那里，这个过程被颠倒过来了：从节俭和集约农耕，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们逐步变成了牧民和猎人。实际上，除了肤色、装束等方面与当地土著人不同外，阿非利卡人变得越来越像非洲人。来到东部边疆，随着越来越远离最初的商业基地，日渐适应有利于牧业而不利农业的条件，阿非利卡人变成了从事半游牧、维生经济的牧民，与非洲当地黑人民族没有多大区别。他们随意而居，生活在大篷车或简陋的土坯草房里，和黑人大同小异。他们靠肉类和牛奶生活，用泥土盖起简陋茅舍，用象牙和鸵鸟羽毛换取武器、火药和枪弹。在荷兰人正式将开普敦移交给英国人之前，阿姆斯特丹派往南非的全权代表雅各布·德密斯特在视察了殖民地后写道：“那些偏僻的殖民区与开普敦相距遥远，坐牛车有时要走 150~200 小时，与文明人没有什么社会联系。耕作促进文明，而那里单调的畜牧生活却妨碍文明的发展。”南非古代史学者齐治·退尔也这样描述德兰士瓦布尔人的生活：“他们居住在巨大的农场上，更确切地说是牲口圈。除了小茅舍外，他们没有更好的房屋，每一座茅舍只有两间、至多三间房间，粘土铺地，茅草盖顶，没有玻璃窗户，室内陈设简陋。这里没有街道，整个邦（德兰士瓦）没有一座桥梁。除了南非的牛车外，没有别的车辆为他们运货。这里只有少量货币流通，商业活动几乎完全是以物易物。兽皮是这里的人同伊丽莎白港或德班港来的商人进行贸易的主要支付手段。”^④

事实上，阿非利卡人已经变成了非洲的一个“白人部落”，适应了周围环境，且如同当地黑人一样，认同周围环境而不是试图驯服和利用环境，但他们继续拒绝认同黑人社会。在英国人到达之前的一个半世纪内，阿非利卡人的时间进程似乎凝滞了，150 年没有使他们的生活方式有质的飞跃，而只有量的扩张。作为一个“白人部落”，他们所能做的就是与当地黑人争夺维持生计的资源——土地和牲畜，还有牛车、枪支和宗教信仰——这使他们拥有实际和想象的优势地位，圣经“赋予”他们权利，枪支给予他们权力，促使他们与黑人分开，以及他们想极力摆脱的通过东印度公司与欧洲和世界市场保持藕断丝连的联系。这种联系非常重要，使他们虽然在生产力水平上不比“野蛮人”或“卡弗尔人”高出多少，却能依靠外在力量在最后竞争中胜过后者。

对财富的渴求促使布尔人向内地的扩张像陷入泥潭一般不能自拔，威胁牧草生长和牲畜安全的干旱的燥热在布尔人那里很快转变成战争的狂热。由于他们使用暴力肆意夺取非洲农牧民的大片土地，土地成为最丰富、最廉价的生产要素；同时通过掠夺土著居民的土地资源而使他们的社会和家庭解体，很容易获得因生活所迫而不得不驯服的劳动力，于是布尔人便把有限的资本以粗放方式投在更大的土地面积上来谋取厚利。和农业相比，畜牧业需要更多的土地，但在劳动力上面的开支则较前者少得多。布尔人通常只需要有两辆牛车，再有一支步枪，一把斧子和锤子，一支长矛，一台搅乳器，一口锅就可以装备一个牧场，^④ 然后再从别的农场主那里借贷几头种畜，命令科伊牧农照管，不久就可以成为像模像样的农场主了。正因为任何布尔人不必劳动就可以轻易地成为农场主，开普殖民地自然

¹ See Carter M. K. Wiebe, and B. Barel, "Tenure Security for Whom? Differential Impacts of Land Policy in Kenya", Land Tenure Center Research Paper No. 106, Land Tenure Center,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91; Mgot-Adholla S. Hazell and F. Place, "Rural Land Tenure Credit Markets and Agricultural Invest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Department, World Bank, 1991; Roth M., J. Cochran and W. Kisanba-Mugeywa, "Tenure Security, Credit Use and Farm Investment in the Rujumbura Pilot Land Registration Scheme, Rukungiri District, Uganda", Land Tenure Center Staff Paper,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August 1992; Roth M., F. Place and P. Hazell, "Land Tenure Security and Agricultural Performance in Africa: Overview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John Bruce and Shen Mgot-Adholla, ed., *Searching for Land Tenure Security in Africa*, Iowa Kendall and Hu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④ [联邦德国] 亨·耶内克著；赵振权、董光祖译：《白人老爷》，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76~77页。

^④ See Neumark, *Economic Influences on the South Africa Frontier 1652-1836*, California, 1957, p. 38.

增殖的白人后代和陆续从欧洲迁来的移民们，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形成雇佣劳动队伍，只是不断地壮大了占有大片黑人土地的地主阶级队伍。

阿非利卡人这种嫁接在奴隶或牧农制基础上的极其粗放的经济形态与资本主义经济原则似乎极不和谐。但正如美国南方奴隶制度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一样，“资本主义社会最有效地剥削经济资源的办法常常是保留附属国古老的、有的是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其对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方式起辅佐作用”¹。不过这样做的后果却必定造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资源配置的冲突：在美国，解决问题的方式最终是惨烈的南北战争，并以代表先进资本主义制度的北方打败南方种植园奴隶主经济而告结束。在南非，问题的解决方式以更为曲折的方式表达出来——先是造成布尔人的所谓“英雄史诗”般的大迁徙，然后发生被列宁称为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与美国南北战争一样惨烈的英布战争，并以布尔人落后的大农场经济制度失败而告终。

这种结果并不是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我们所探究的是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布尔人一方面力图向开普市场出售更多的牲畜；另一方面，奴隶制式的生产关系对劳动效率的制约和粗放经营方式，迫使他们的商品生产只能以最为落后的方式周而复始，没有质的提高，只有量的扩大。当开普市场的牲畜供不应求、价格猛涨刺激农场主们去扩大生产规模时，他们却无法靠奴隶或牧农来提高牧场的单位面积产量，或是培育出产量较高的牲畜品种，而只有通过扩大牧场面积来满足市场的要求。而南非内地土质瘠薄，载畜量本来就很低，为了增产，农场主往往在同一块牧场上过分放牧，导致牧草被啃吃过度，许多牧场报废，载畜量进一步下降，到后来平均1英亩（6.072市亩）只能养1只羊，5~12英亩才能养1头牛。^④农场主要增加牲畜头数，只有不断更新牧场，扩大放牧的土地面积。此外，农场主越是深入内地，离开普和其他沿海市场的距离愈远，将牲畜运送到贸易中心的费用也就越高，要弥补“损失”，他们采用的唯一做法就是尽量多地圈占新牧场，饲养更多的牲畜。这几个因素加起来，结果便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越是深入内地，饲养的牲畜越多，农场主占有土地面积也越来越大，以至于不知道边界究竟在何方。这样，一波又一波、持续不断的土地扩张就成为布尔人极其落后的大牧场经济结构不断地复制和延续自身的一个必要和根本条件。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南非土地问题的形成，除了殖民主义者侵略性的思想观念之外，主要原因之一是阿非利卡人本土化了的殖民者与原住民之间的社会经济结构（关系）的趋同造成一系列冲突的结果。开普殖民地的荷兰殖民者已经不再是东印度公司的一般雇员，而是变成了阿非利卡人，他们既与祖国荷兰，也与欧洲大陆事实上脱离了密切的关系，他们不像后来征服了原住民也同时征服了他们的英国殖民者那样已经进入工业化时代，拥有非常先进的生产方式。他们所能做的，就是靠粗放的方式进行简单的扩大再生产，直到黄金矿和金刚石的发现，他们依然滞留在土地上，与非洲农民进行激烈的竞争，只是后来依靠南非联邦国家政权的力量，才得以巩固两个半世纪以来掠夺的成果，并借助种族隔离的法律制度试图使之永久化。现今南非阿非利卡人的经济结构虽然已经不再那么单一，但要改变历史形成的结果却不是南非黑人政权短期内能够实现的目标。

（责任编辑：安春英 责任校对：邢永平）

¹ 斯·霍尔：《支配情势以及原奴隶社会对文化的应用》，载照那斯图等编：《种族问题国际会议文集》，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④ W. de Kiewiet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Social and Economic*, London 1941, p. 41.

The Feature of Iraq's Ba'ath Party in the Course of National Building

Han Zhibin

pp. 36– 42

The nationalism of Iraq's Ba'ath Party had played a key role in formulating the national regional political system, economic structure and cultural strategy. There were five characters of formulating Iraq's nationalism of Ba'ath Party originating in exchanging of west-oriental cultures, seeking in pan-Arabization, modernization of 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 multi-identities of creating of nationalism, structural characters of nationalism. Iraq's Ba'ath Party had made efforts in political develop-

ment, economic reform and improv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 but its target was far away from meeting the needs of globalization in terms of the ideology topic and its practical result. In terms of the practice, it appeared its unwillingness, compelling and inborn weakness. In terms of the ideal, it was short of cohesion, coexistence and renewal of mechanism. In the future, the nationalism of Iraq's Ba'ath Party should use opening attitude to mix itself together with other civilizations and the wave of globalization.

A Comment on South Africa: An Emerging Power and its Foreign Strategy

Zhang Zhongxiang

pp. 48– 53

South Africa is now the only new emerging power in Africa continent. South Africa is showing us active diplomacy sinc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South Africa tries to revive Africa as its mission, and tries to demonstrate its role to maintain reg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In recent years, South Africa enhances south-south cooperation, emphasizes to develop south-north relation. The focus of South Africa's diplomacy is to take part in

global management. The ideal of "Africa Revival" advocated by president Mbeki is the source of South Africa's diplomatic strategy. In generally, South Africa's diplomacy of Mbeki times has three characters: opening, seeking of power status, advocating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joining global management, insisting in diplomacy independence and objecting pressure from outside world.

Afrikaner and Their Convergence with the Black Economic Structure on Land Problems in South Africa

Sun Hongqi

pp. 54– 58

In the middle of the 17th century, employees from the Netherlands' East India Company came to the Cape and established Cape Town colony. During the late two hundreds years, the native Africans, those colonists became the owner of the land, and they had only 14 percent of the whole population, but they occupied 87 percent of the whole land in South Africa. For this case, South Africa was once one of the countries those had most serious land

issue. There were many reasons for causing such serious land issue in South Africa, and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was the unanimity of economic structure between the new Africans and the native black people. For this case, the colonists and the native people broke out serious conflicts in grasping the land, and that was also the internal historical source of the land issue in South Africa.